

# 人间四月三十年

——读《重返1976》给袁敏的信

□王旭烽

袁 敏：

从读你的“重返1976系列”第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初稿,到《收获》杂志专栏里你连发的后两篇《从醉白楼到留椅屋》《追寻真相》,关于30年前的这个人间四月开始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就与你开始了悲欣交集的心灵对话。当我读完了先期发表的三篇文字之后,我的第一个直觉是,我读到了近年来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是的,“总理遗言”一案过去30年了,但对那些亲历的人们而言,事情真的完全过去了吗?直到今天,我才对中国人的政治生命有了一个认识。由于你们的特殊经历,不管你们愿不愿意,你们这一群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你们的政治生命,这生命延续至今,并注定将伴随你们终生。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总理遗言”案真正的核心人物——遗言的文案创造者“李君旭”吧,你塑造的这个人物,是最为成功的。

这里牵涉到纪实文学的一个文本上的基本问题:纪实文学能够如小说一样塑造人物吗?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提供了塑造人物的可能性;纪实文学是真实地呈现生活,是选择了素材之后的表达。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因为你笔下的许多人都是我熟悉的,你的父母,哥哥姐姐,他们作为事件中的一个群体出现时,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你的母亲董阿姨在你笔下,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但这些人物的还不是难写的,李君旭才是一个下笔前非常值得琢磨的人。那么,这个琢磨的过程,是否就是塑造人物的过程呢?

你与他认识最早,我与他虽然交往不多,从认识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们说起蛐蛐儿李君旭,几句话就可以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说来,他就是最好写的人物。但你又会同时发现,他是最难写的人。这或许也就是你的第三篇《寻找真相》完成之后,你为什么还要补记再三的原因吧。

一方面,你希望真实,因为文学虽然流派众多,但所要表达的第一真谛还是真实,何况纪实文学,真实就是它的生命。而我要说,你在《追求真相》里所描述的那个李君旭,已经是最贴近他本人真相的那个李君旭了。但另一方面,李君旭作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况且这位英雄目前的境遇又是如此的苍凉,我们有必要如此真实吗?因为那个真实的李君旭和我们心目中的那些传统道德文章中所宣传的英雄,毕竟是有距离的,所以我特别理解袁中伟后来给你的那些建议。同时,我也想根据对你文本的阅读和我所认识的那个李君旭,谈一点我个人对这个人物的认识。

李君旭于我是名气在前,相识在后。实际上你们家一平反,我们也就知道你家没有人参与编写“总理遗言”,是蛐蛐儿自己独立完成的,抓进去高压审讯之后,胡乱供出了一些人,那些人是真的无辜。尽管如此,大家对李君旭并没有什么恶感,总归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嘛。这样,我们印象中的李君旭,就是性格有些敏感罢了。李君旭很快就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名声大震,我记得当时汽轮机厂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年轻人,一个是今天还活跃在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创意策划人朱海,还有一位就是蛐蛐儿李君旭。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啊,龙!》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之后,在浙江文学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但感觉中他依然不是一个文学中人,而是一个政治中人。我和他后来在一起开过

### ■看小说

## 温亚军《回门礼》某些传统是这样改变的

《回门礼》(《山花》2009年第12期)叙述的是艾娅春节回娘家的故事。艾娅虽然在人们的羡慕中嫁给了镇上的雷吉尔,但雷家并不富裕。过了年,雷吉尔就要出去打工,艾娅眼看只能守着既没有男人又没有家当的一个空家。于是她要男人四处想办法借来5000元钱,大办回门礼。给父亲买茅台酒,中华烟,鸭羽绒服、三轮摩托车;给母亲买银手镯;给妹妹买高腰皮靴、低腰牛仔褲。艾家人很快明白,艾娅是企图让父亲把手艺传给自己的丈夫雷吉尔。艾娅的父亲是一个瘸匠,发了不大财,却能养家糊口。女婿走的时候,父亲说自己老了,要女婿骑着摩托车与自己一起走乡串村。由于保留技术和手艺诀窍的需要,传儿不传女的规矩是许多民间手艺传承的传统,也是一种古老的习俗。艾娅没有兄弟,父亲原本打算把手艺传给小婶子的儿子。小女婿雷吉尔的感恩、路哭、孝敬,打消了父亲不传外姓的顾虑。温亚军在对一个习俗即“回门”的叙述中,完成了对另一个习俗即“传儿不传女”如何变化的叙述,当然这一传艺习俗的改变最终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变化,女儿与女婿幸福生活的需要。

## 南侯《最后一个农民》农村的改变与农民的尴尬

毫无疑问,近年来农村始终处在城市化进程席卷中,并迅速惊人地变化着。《最后一个农民》(《四川文学》2009年第12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这种变化及其影响。在土地被分割成七零八碎的块块片片之后,大型收割机器就不来村子了,因为成本太大,收益太小;曾经适合在小地块上耕作的小型收割机,由于大型收割机器的冲击也不再生产了,周有福只好重新开始拾起锄头、镰刀等传统工具。但他却没有耕亩,虽然在村长老家里找到了驴,但村长养驴是卖驴肉的,因为卖驴肉的收益远远超过了种田。周有福只有去修理手推车,还要再去买一把新的镰刀、买一块磨刀石、找一个光滑的场院、找一个轧麦子的碌碡……虽然小说只是农民周有福在如何收获麦子、搬运麦子、脱粒麦子问题上遭遇困惑的一个文本,但它触及了农村变化中一些重要问题。大量剩余劳力转移之后,土地荒芜、土地分散耕种效益低下、土地集中经营机制建立等等,这些都是当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由此,周有福就不是“最后一个农民”,他只是这些有类似境遇农民的代表。

## 谭自安《一个屋子里的邻居》如何面对陌生的世界

《一个屋子里的邻居》(《芳草》2010年第1期)叙述的是农民走出封闭的、习惯的世界之后,如何面对打开的、陌生的世界。住在大山里的阿满和妻子本来过着安逸、自足的生活,在被扶贫工作组反复劝说搬回到村子里,并与一个“据说做过村干部”的男人阿远住在一起后,阿满开始感到紧张。他怀疑阿远会透过墙缝偷看自己和老婆;他担心阿远有一天会把自己家的东西偷光;看见枪毙强奸杀人犯的布告,他担心阿远对老婆会做出不可想像的事情来;阿满求助道公祖咒阿远死去,很快阿远病了,阿满却害怕了。对杀人的恐惧促使他要挖出鸡头,但他开荒似地挖遍一大块地,却没有找到象征阿远生命的鸡头。小说成功呈现了阿满走出深山,特别是与陌生人居住在一起之后极度的紧张和不安,他在变化纷繁的世界里,找不到安全感,无法建立起对世界的信任。有意味的是整个作品中,阿满的老婆对阿满的这一切警惕、怀疑、担心毫不在乎。她认为阿远以及村子里的世界没有阿满想像的可怕。作品最后,阿满想要回到山里居住,但她却在阿满寻找鸡头的土地上开始播种了。

一些会,记得最大的一次活动是我们一起得了首届浙江青年作家明星奖。获奖者是李君旭、李杭育和我。颁奖大会是在省政协办公大楼举行的,颁奖者为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罗东。那次会上李君旭还专门致了答谢辞。

我印象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那时的李君旭,有时半夜里会起来梦游。有一天报社发现办公室门上天窗洞开,有人从上面爬了进去,还留下了大脚印。李君旭立刻就去了报了案,最后一查,那脚印是他自己的,但是他本人的确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不久后他去了《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当年这份杂志发行量很不错,但他真正的悲剧就在这时候总爆发了。我和这个杂志的编辑们比较熟,发现他们都知道李君旭有病,而且办杂志是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在这方面他又是个外行,总之从一些人的口气中,我能够感觉到,人们不再把他当回事了。而他自己的病情也已经越来越重了。终于有一天,他再次重重地摔倒,头部受伤,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以后的事情你都写到了,父母相继去世,美丽的妻子离开他去了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站起来,住在一个民办福利院中,与一个傻瓜住一间屋子,时间长了,就开始失语。我上一次看到他时他正躺在床上,牙齿没了,一头卷发剃成光头。我不想再说我们看到的场景,我只想说,他慢慢笑了一下——我心中一动,我看到了1980年代的目光笑容——真的,一道1980年代的目光,是从以往逝去的岁月中回放而来的,没有被商品经济大潮洗礼过的目光。

是不是因为1980年代较之于以后年代的不同,而李君旭已经被命运定格在1980年代了,所以他反而成了我们纯洁的青春时代的象征。我并非要在这里刻意歌颂纯洁,我只是想说,那个眼光里透露出的天真的神态,一方面依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又预示了人的命运中那古希腊戏剧般的悲剧意义。

实际上我们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关于真相的,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以为的、记录的,和实际存在的是否一致;第二才是对这一现象的评判。也就是说,即使表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有许多种道德评判;可以是一种战略战术,也可以是一种智慧;可以是一种善举,也可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可以是恶作剧,也可以是邪恶的报复;可以是回避什么,也可能是妄想症患者;可能是一时冲动,当然,也可能是老谋深算的圈套。人类的精神事象如此繁复,为什么对心口之间的距离我们的判断就那么简单呢?

正是通过阅读你的这些文字,我对李君旭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毫无疑问,他天性中有着悲剧的元素,一方面,他天资聪颖,形象英俊,有过人的精神渴求,但另一方面性格怯懦胆小,对恐惧有超乎常人的体验与感受。

如果在今天,一个小孩子毫无目的地不停撒谎,大人可能会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相应地找心理医生来对其进行心理矫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年代,你文中提到的那些蛐蛐儿的小毛病,偷个书啊,对女孩子撒个小谎啊,其他一些什么,包括他那种青年领袖式的自我感觉,他的虚荣心里包含的一点小小的野心,还有出于过度自爱而产生的撒谎,比起那个时代这群年轻人在小阁楼冒着生死谈论局势,纵横天下,这些缺点,都还是可以原谅的。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经历正常

### ■评 论

## 秀笔砌出的阁楼

——读“她·阅读”丛书

□王 董

“她·阅读”丛书面世了。丛书收录了 蒋韵、范小青、葛水平、徐小斌、范承玲和阎桂花六位女性作家的作品。

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用精湛的短篇,浓缩了城乡史交错呈现的生存轮廓。《城乡简史》看似一个巨态的架势,但作者却巧妙地将要书写之书又捐书给乡村小学,由此将账本混在其中不知去向的自清与到城里当农民工的王才,身份进行了置换。自清要到账本,而王才却寻着自清家庭帐本上记的地址,按图索骥地来到城里小区收废品发了财,连407块钱的香薰精油都觉得便宜。而自清帐本上详细的帐目,也反衬着他这个城里人过去生活的拮据。小说从结构到形式上都有以小见大的装饰作用。无论是中篇《暗道机关》《不要问我在哪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及众多的短篇,范小青都勾画出了人生存在的荒诞与困惑。在她的小说集《我在哪里丢失了你》就有着众多对人事事的疑问与迷茫。

蒋韵的《心爱的树》,人物穿插的年代跨度都很大,一个三万多字的中篇,故事的主线则从民国国延伸到了新中国。作品这样大的跨度,人物自然也经历了抗战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有了四个孩子的梅巧其情感游离在大先生和席方平之间,当她和席方平渡过爱河与磨难之后,与大先生再相聚时,大先生的宽容与大度的情操无不让人折服。诚然,这样设置作品的走向,可信度很让读者揣度。但由于作品的诗化结构与情感的真实,这种可信度就愈发被认同了,因为百岁老人若活到今天,他的经历一定会比作品本身描绘的还要丰富多彩。笔力具有诗意而又大处着墨的蒋韵,作品集《妹妹上花楼》把人生山高水长的境遇抛入笔下,这一点,在她的另一个中篇《英雄血》里,也能看到。

创作过《羽蛇》《敦煌遗梦》《双鱼座座》《迷幻花园》等作品的徐小斌是典型的实力派女作家。她绵密绣花式叙事结构,常常会把读者不自觉地引入颇有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中。作品集《别人的花葬》收录的《亚姐》描写十年前的亚姐水仙为重返荧屏送礼行贿,如愿以偿得到了一个角色,意外走红。谁知出事意外,一切都戏剧性地周而复始;《吉耶美与埃耶梅》吉耶美与埃耶梅是一对母女,她们出身于泰国王室,却与中国的两代人发生了戏剧性的关系,这是充满了伤怀之美与宿命感的故事;《过门儿》里,远志和乔一一起抓鱼。在搅起的一团浑水中,乔的手指两次碰上一什么滑溜沾糊糊的东西。被惊出一身冷汗。巨大的黑鲫鱼疯了似地乱撞,把

## ·文学批评·

王 董

的生活的历练,改正种种性格缺陷,走上了基本正常的轨道。

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发育不健全的灵魂,如果假以岁月调整修理,是可以整顿好的,实际上青春就是一个整顿与完善灵与肉关系的阶段。但不幸的是,我们青少年时期的整整十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这是一个多么不正常的年代。而一旦被捕,因为怯懦而殃及他人,我相信这颗敏感的心是会格外自责的。你知道我读你的文字到哪里最难过,就是看到袁中伟放风时发现一行字:小弟,对不起。我在这里听到了灵魂的呻吟。

一方面李君旭必须承认自己供出了无辜的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甫志高”。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个人如果成了甫志高,那是比死还羞耻的事情,何况他的怯懦确实几乎给所有的人带来了灭顶之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李君旭出狱之后没有劫难,平平安安地生活到今天,在社会开始越来越宽松的今天,他或许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羞耻感吧;如果这时候你们一起来回忆当初的历史事件,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属于撒旦的还给撒旦,该自己挑起来的自己来挑,他或许不会再下意识地隐瞒什么吧。

但是我们都已经看到,实际上他的一切思想都停留在1980年代了。袁中伟说的他比人们想像的要清醒,我想是不是应该特指他1980年代的那部分思想,而在那部分思想里,恐怕他越清晰,就越要下意识遮蔽呢?

我以为你的文本的意义,超过了我的心理期待的部分,正在这里。你在一个非常深入的人性层面上展示了一个青春群体,促使我们深入地去思考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形成的奥秘。正是在读了你的作品后,我对李君旭有了某种“英雄”意义上的理解:失恋可以让人去杀人,也可以让人去自杀,为什么李君旭却在这样的关口写下了“总理遗言”呢?这还是有着他身上优秀素质的那部分的直接动因的。正是这种素质给“总理遗言”带来了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直到今天重读,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的真实感,尽管它确实不是周总理写的。

以上我通过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解读了你笔下的主要人物。下面我想再谈一个我自以为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所描述的事件中揭示的那个时代精神的美学特质。这种照耀在当年我们青春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的绚丽色彩,就这个素材而言,如果不是用纪实文学的方式,而是用小说的方式,恐怕真的还会有人怀疑其真实性的。

首先,你所记录的是准确的时代情绪,是全民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确就像正要喷发的火山一样,全民的情绪这样的一致,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李君旭编造遗言,还是袁中伟寻求真理,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情怀,我指的是一种具有审美精神的理想主义情怀。而且这也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士大夫情怀,它直接接通的是马列主义。主义在此被作为一种信仰,也被作为一种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舶来物。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三大来源,都是从西方哲学的源头而来。那么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涉及到基督教文明。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信仰中,道教是主张乐生的,养生、长寿、天人合一,肉体是第一位的,精神是可以配合肉体的。道教不主张为教义去牺牲。佛教为此生是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意义在修往彼岸,而好好地活着,就是好好地地为将来修行。中国历史上固然有着成仁取义的英雄,但从文化背景上说,并没有殉道传统。

而在基督教文明中,早期就出现为坚持教义而牺牲的象征,实际上耶稣就是上帝献给人类的牺牲。马克思主义并非基督教,但在为理想献身的热情上,我以为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借鉴关系的。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由于杜绝了一切讨价修教主义,实际上上一代青年人,反而接受的是比较单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青春总是诗,即使是信仰,也会在其中去发现美和享受美。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如果有条件多接触一些书籍,精神的触角一定会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引以为自己的精

一向温和的远志也给激怒了。然而乔却分明感觉到他是被惊吓出的那种疯狂。油水溅了两人满头满脸。远志的眼睛渐渐变得血红,这时乔才看见他手里原来持着一把利刀。远志的眼珠涨起老高,逼视过来,溢出腾腾杀气,乔一步步向后退,远志红着眼挥起一道白光,划出一道哆哆嗦嗦的弧线。大黑鱼流着绿血窜起丈把高,乔这才明白远志杀的不是自己——在这段文字的描述中,明喻暗喻的感受都被人物的动感展示得活灵活现。但是徐小斌仍觉得不可过瘾,竟又写了《过门儿》的续篇——乔生了个美丽可爱的儿子,而她得到的却是新一轮的心灵折磨与战栗……

丛书小说卷《一个人的车站》的作者阎桂花,应该说是一位新人,她出身于煤矿,小说内容的切入点自然也离不开这个地域。但作品中的男女老少,却是各有其貌、各有其情,同刘庆邦擅长写井下的矿工生活不同,阎桂花的小说作品书写在井上空间产生的爱恨情仇。如写心存了近20年隔阂的《父亲与公爹》,介蒂终释,涌现出的是男人的情感;《旺火》则是描绘小区的物事人非;《槐花魂》却是一个抗战中人物节操的展示;《E少年》表现网络时代少年走入误区的无奈;《赵裁缝》是一个贤妻良母忍辱负重的故事;在和平街上做裁缝活儿的不是一家两家,可赵裁缝是最有名气的,老年人满意,年轻人满意,孩子们也满意。而就是这样一个贤慧灵巧的女人,丈夫却与他人偷腥并出了人命闯进了大狱,赵裁缝事后却认为丈夫有骨气,好汉做事好汉当,宽容了他,等他出狱归来。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类似玉卿嫂式的人物。阎桂花的作品反映了特定环境中人们情感的压抑与寻求释放。在文字叙述上,阎桂花的作品缺乏弹性与灵动,但朴实的状态也是她作品的一个特点,值得品味。

以小说《喊山》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葛水平,这次拿出的还是散文集《今世今生》。实际上,葛水平在写小说之前就写过多年的散文。称自己为行行走写散文的葛水平,在《归于静的写作方式》中表明了自己的写作归宿:“我无法对当下众多的写作方式去思考,我只是,热眼冷心。我对情感的那一根结一直系在乡村。”葛水平的小说都是写乡村生活的,但葛水平的散文并不局限于“乡村思考”。这些散文更多是类似随笔一样寓情于景的随想曲,无论是《上善若水》里对阿炳及《二泉映月》的精细思绪的表现,还是对赵树理文学高度的感叹等,都是这类人生的感悟。由于葛水平早年当过戏曲演员,她的文字就带有一种韵律感。这在《一路都是春水》和《美丽的遥远》中都能感受到。葛水平的文字是泉香而酒冽的。

用以鸣秋、以风鸣水来形容范承玲的文笔,再贴切不过了。其散文集《有些时间是用来浪费的》就体现了她素雅淡定的风格。她的文字浅淡、精致,读来不累,但里面又不乏含苞的意绪。在散文《风雨桥》里,她用平和的语气描写到:“故事成了桥,一座連結记忆的桥……它应该是一座木制的桥,它应该是一座落在山凹里,桥的延伸处应该是镶嵌在山的怀抱,它应该是在没有公路的地方,连接这山和那山、连接外面的世界唯一可行走的通道。”读罢很有水之无声,风吹而鸣的感觉。而她的《五月花魂》《又见蓝莲》《路上心情》等,也都是有这种波澜不惊的隽永的小品。鲁光认为她的散文观察人生细腻,表述情感娴熟,文字老到。几乎所有文字,都渗透着她的深情、爱恨、思索和忧虑。这些评点都非常准确,点到了范承玲散文的妙处。

## 2010.1.4.

(星期一)

2

神营养。我们很小就读马克思与女儿的对话,因此有了“怀疑一切”的离经叛道式的眼光;我有一个同学甚至就直接取了马克思夫人的名字“燕妮”。我们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地上的讲话,我们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还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我们也想了解什么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还有考茨基,甚至巴枯宁。我上高中时就在老师辅导下半通不通读《哥达纲领批判》,而你也在你的文章中提到了你们偷来读的翻译名著,那些作品大多是欧洲名著,我们往往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它们放在一起,同时作为我们的文化大餐。

所以,你才会记录下那场30年后的生日宴会吧。在这个令人感慨万分的李君旭的生日宴会上,李君旭前女友J朗读当年抄下的莱蒙托夫的诗行: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这才是爱情,人因此不枉来这世界一次,它肯定了生活的正面意义,精神的无比丰富,人性的全部张力和迷人。就是这些星星之火般的精神营养滋养了当时中国的一些优秀青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在杭州,在“总理遗言”案中,袁中伟不是编造者,但确实是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实际核心人物。如今他们都那么普通地融入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要是你不把这些记录下来,人们真的难以想像,当年就是他们这一群人,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启迪民心。而在1976年1月之后,袁中伟会只身漂泊到中国各地去寻求革命真理,这就像俄国革命时期的民粹派,又像青年毛泽东拿把油纸伞去考察革命。

“总理遗言”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十年浩劫的尾声,在多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就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精神天地也随之在中国人民面前展开,而有些东西就此告别历史舞台。30年来,我们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接上了许多中断的东西,但有些东西却又被遮蔽了起来。你的文字重新揭示了那些精神事象,告诉我们,这样的生活并不是真实的,而且现在依旧以它的精神向度默默而顽强地存在。

你的原意,原本是要通过揭示真相,来展示那个时代一群年轻的受难者的心灵。但你们同时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怀想的审美体验,你所展示的这个精神层面的生活,表面上看,到上世纪80年代就结束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杭州人民龚自珍,他的古诗诗曾被形容为中国古典诗体的殿军,一抹最美丽的晚霞。你的这些记录,也让我看到了30年前人间四月那美丽的一去不复返的晚霞。也正因此如此,这生活显示了它独一无二的光芒。

我最后要说的还是作写者的勇气,这并非是说这个题材有什么禁区,而是想说,一个真正的叙述者直面笔下的世界时,实际上就是在与自己的命运遭遇。有时它甚至还是一个箴言。前不久,我在一次有关翻译家冈先生的纪念研讨会上发言,讲到了一个观点:文学艺术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前与自己的命运遭遇。我这样以,是针对冈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而言。我发现,在作者、译者和作品主人翁之间,有着极为惊人的命运的重叠。同样,李君旭以20出头的青春年华,编造了新中国缔造者之一的“总理遗言”,与此相关的一群青年,实际上已经在这一份“遗言”中与自己命运提前遭遇。

你的文字有力、简洁、厚重,有的章节可透纸背,细节又是那么真实和独特。你反复核对,不因为可透性而牺牲真实性,而这样一次次重新感受、挖掘、讨论、收集、整合,依然会有困惑和犹豫,依旧会有无法清楚的迷茫,又有在写作中重新唤起的万千往事,因为这一切再勾起的爱恨情仇,甚至新的疑问,越往深处走越不可思议的人性,重新审视的抉择……所有这一切,只有你一个人感受,无人替代,那是孤独的。

但那也正是幸福的。是值得的。

旭 烽

邓元梅的小说《大别山的女人》以家乡湖北红安的革命历史为背景,给我们虚构了一段革命时代的情爱故事。大别山除了指代山名外,其本身是一种革命的象征符号。革命总是尖利、刚硬、腥风血雨的,可作者偏偏在这里安插了一群柔弱的女人,羽翼在这种恢弘的时代背景下书写她们的命运,达到水与火的交融,个人与时代、情爱与革命辉映的心灵叙事史。

从表面上来看,李金秀之所以投奔革命是因为李大爹的煽动和个人的困境。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丈夫出逃后,她暂时丧失了妻子的职能和身份。在这篇小说中,这种女性的革命理念是异常感性的,革命理念只有与内心的那种最隐秘细腻的经验相呼应,成为缠绕于情感之树的一支藤蔓时,才能变为身体和精神的一部分,召唤激情,成为信仰。在小说的结尾,古天雄被王小龙的堂哥杀害后,李金秀和古红菊为了拿回干枯的头颅,相继断送了各自的性命。从文章的外在结构来看,这一结果是轻巧而简单的,但如果依据小说的内在结构,则这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演绎——既然李金秀的革命意义在于得到男性的认同和情爱的转移,那么随着古天雄的遇害,她的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其作为一位女性革命者的身份在小说中也归于终结,而死亡就是这种身份终结的象征性表述。

董香芸是本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在这一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无限的怜爱和赞美。她的性格与李金秀形成了鲜明对比:逆来顺受、温柔宽容、在世的沧桑中变得坚韧平和、关键时却爆发出内心的强大力量,在香芸的心目中,只有一架纺车和对于古天雄的爱恋,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单纯自足的内心世界。纺车是农耕文明中“男耕女织”生活模式的典型事物,小说通过纺车、纺线这类事物的符号化表述,来完成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董香芸一方面与李金秀等人形成不同性格和观念的对立;另一方面,她在情感对象和情感命运上有着和李金秀一致的地方:她们俩都深深地爱着古天雄,甘愿在男女关系中扮演从属者的角色;同时,她们面临的困境也都一样:不能与心爱的人结合在一起,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属于同样的一出悲剧。

小说在艺术手法上走的是传统的写实路线,常常借助符号化的手段来完成对人物的精炼塑造。此外,小说对方言的引入及革命与情爱因素的运用,也使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虽然从整体看来,这部作品的能力不够稳健,在尾部的情节略显臃肿,但在一些对白和心理刻画上却显得精细而老到,体现了较强的写作实力。

本版责编:刘 颖 饶 翔

一曲女性情感悲歌——读邓元梅的《大别山的女人》

□钱刚